

新书摘

1903年,梁启超结束了为期十个月的美洲之旅后,一摒此前政治上力倡“民主”“共和”,思想上“发明新道德”的主张,转而面向中国先贤大儒,从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,以图通过道德重建,恢弘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本原之学,并担当救国救民之责。两年后,他编纂《德育鉴》,精选先秦至明清65位先儒421条德育修身的格言语录,分为“辨术”“立志”“知本”“存养”“省克”“应用”六篇,为新学青年量身定做修身指南,以培养有志之士伟大人格。梁漱溟、胡适、徐志摩等民国风云人物都曾在成长中受到过《德育鉴》的重要影响。如今,这本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年德育修身读本,已成为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国学指定教本。借着为《德育鉴》撰写题解的机缘,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、中西书院院长刘东在新著《德教释疑》一书中,沿循梁启超对道德本心的叩问与修持,解开围绕传统“德教”的疑团。

## 呼唤过“新道德”之后 梁启超为什么要返求“旧道德”

□刘东

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?

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,等于是要追问:梁启超当年为什么要编选《德育鉴》这本书?

遥想1905年前后,梁启超立场陡变。据统计,在其五十多年的生涯中,梁启超的立场即有“十变”。这曾引起过广泛的物议:“孙中山痛斥其‘忽言革命,忽言破坏’,‘首鼠两端’。章太炎指责他‘始言革命,终言立宪,浮夸转变’。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‘流质易变’。”而他当年的学生郑振铎,也曾经未置可否地总结道:“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——或者可以说,最为人所诟病的——一点是‘善变’。无论在学问上,在政治活动上,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。”

然而,这种“善变”未必就是缺点,相反倒可能是他主动追求的。梁启超在早岁就已自觉到了这一点:“《语》曰: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焉,人皆见之;及其更也,人皆仰之。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,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,百变不离其宗。”

因此,我们不能只盯住他的这种“善变”,而应更深一层地去考察:在那些富于戏剧性的转变中,其思想有无愈发丰富,立场有无愈加稳固,环顾是否更为周全,见识是否更

为可靠?而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,首先便须回顾其早先提出的“新民说”,以厘清他在转变前的思想和立场。当年,为了拯救“积贫积弱”的中国,他曾率先提倡过“道德革命”——想要“新国家”就先要打造“新国民”,而想要“新国民”就先要倡导“新道德”——“国也者,积民而成……未有其民愚陋、怯弱、涣散、混浊,而国犹能立者。故……欲其国之安富尊荣,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。”因此,他便必须对传统的“旧道德”大加讨伐,而这样的批判,还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开花。

但是,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总结的,他当年发出的批判谈不上“平心之论”——“西人说中国‘野蛮’,梁启超持之以绳尺,作《中国积弱溯源论》,从历史的中国里搜寻爬梳,翻出‘奴性’‘愚昧’‘为我’‘好伪’‘怯懦’‘无动’等切割支离之词,用来说当时中国的‘病源’……它们被梁启超大而化之地编连为一体,显然并不全是出自中国历史本身和真能统括中国历史全体……梁启超之所以选定这些词汇,正在于由此编成的大而化之鲜明触目,能够一一对应地描绘出时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,以此为‘野蛮’作佐证。”所幸,这位学者随即追加了一句:“梁启超是

一个善于自我纠错的人,所以后来半途知返,并力为阐扬中国历史中的光明一面。”这就要归结于他那种不惮“流质易变”、绝不固执己见的突出个性了。要想了解梁启超这种“善变”的个性,便不得不提到他1903年的那趟美洲之行。他从中得到了始料未及的惨痛教训,由此才从“新派人士”的行为做派中,幡然醒悟到了“旧道德”的不可少离。对此,其《年谱长编》如此描述:“先生从美洲归来后,言论大变,从前所深信的‘破坏主义’和‘革命排满’的主张,至是完全放弃,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,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,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。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,见闻益广,历练愈深的结果。”

此外,我们还可从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下述文字中,了解到“新派人士”当年竟有如此戏剧性的、令人扼腕的蜕变:“在数年前,自命为爱国志士,同人亦公认其为爱国志士,而今也,或以五六七品之头衔、百数十金之薪俸,而委蛇以变其节也;或征歌选色于都会,武断盗名于家乡,而堕落不可复问也……设其时,有旁人语我曰‘数年以后,恐足下其亦如彼’,则我必艴然怒也。庸讵知彼辈自始固非尽出于伪,如吾所谓自暴自弃、甘心为小人也。”此等易变,不禁让人想起庄子“梦蝶”之疑,弄不清他们究竟是“退化”到了这般地步,还是“还复”到自己的本面目。

看到这里,一般人或许只会想当然地觉得那不过是“热情消退”罢了。然而,梁启超却要再进一步,直接追究到人们的“道德心”本身。针对这一点,又有一位当代学者曾在《中国学术》杂志上,比对了章太炎和梁启超不约而同的体验——尽管这两人隶属于壁垒分明的不同阵营——总结出了他们当年所共同遭遇的“道德两难”:“以掀翻既有秩序和既有道德为目标的革命……却必须以道德行之,这就是革命与道德之间的两难。”如果再往自己身边打量,我们又不难发现,这种“两难”居然还在被原

封不动地复制着。一方面,过去几十年所宣扬的“破旧立新”,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“道德标准”,而传统的价值也便随之被弃如敝屣。可另一方面,又因太过执迷“破字当头,立也就在此中了”,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撕裂、更加败坏,诚如回到了霍布斯的“丛林时代”。也唯其如此,我们才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到,梁启超在呼唤过“新道德”之后,何以又回到了《德育鉴》的编选中,情不自禁地呼唤起“旧道德”来。正是在编纂于1905年的这本书中,他对照着提倡“致良知”的阳明学,以及王学后人对其先师的追忆,愤然发出了“今不如古”的慨叹:“微言大义,流风余韵,渐灭以尽,人欲横流,举国禽兽。而近者复有翻译泰西首尾不完,字句不明之学说输入,学者益得假以自文,欲举我神明千圣之学,一旦而摧弃之,而更何有于先生?”意味深长,发人深省的是,甚至就连这一点也同样是“无独有偶”的,因为它也很像当今兴起的“国学热”,正如我曾在一篇访谈中对此分析的:

正由于本土历史的应有连续性,被来自西方的剧烈冲击给阻断了,而原有的那个文化共同体,也在外来的碾轧下失序了,这才使得人们蓦然回首,发现自己正受到“传统丧失”的报复。在这个意义上,事实上这一次的国学热,还真不是自上而下形成的,倒是老人们听《百家讲坛》听出来的,属于“礼失求诸野”式的自我修复。在我看来,这一点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,它再一次胜于雄辩地证明了,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而言,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,乃至它的那种言说方式,都不光仍然是最有活力的,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。

(摘选自《德教释疑》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  
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# 关住每一滴

一个滴水的龙头,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  
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人身体一天的需要

